

January 2013

Dialectics between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on Overseas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Jin J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Ji, Jin. 2013. "Dialectics between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on Overseas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3, (1): pp.39-45.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1/5>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文学与政治的辩证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之一

季 进

摘 要:本文较为全面地评述与反思了海外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思考,既有对左翼文学、左翼作家重要研究论著的论析,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意识形态中国化研究的个案解读,呈现了其中知识与权力相互角力,内在与外在彼此刺激的复杂程度,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必须放弃大历史叙述式的单音模式,而重回众声喧哗的历史现场。海外学界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我们对外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认知,也为反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更多的面向,为以后的研究预留和指明了新的阐述空间和论述向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海外汉学

作者简介:季进,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电子邮箱:sdjijin@126.com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子课题“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Title: Dialectics between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On Overseas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This paper surveys and reflects on the overseas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m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rough critical analyses of major studies on Left - Wing literature and writers as well as case studies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aesthetic ideology, the paper tries to expose the struggle between knowledge and power and reveal the complexity of mutual stimulus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study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hould discard the gr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with one dominant voice and be re - positioned into the multiple voiced historical site.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overseas studies have enriched ou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more aspects for further reflection on sinicized Marxism and expanded the scope and pointed to untapped dimension for future studies.

Key words: Marxism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Author: Ji Jin, Ph. D., is a professor at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Email: sdjijin@126.com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经典化,很长时间以来往往伴随着庸俗化和博物馆化。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教育体制,成为教科书的刻板内容有着直接的关系。通过反复地诵读、记忆、灌输,马克思主义在某种层面上成为定律甚至教条。这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去历史化”处理的方式,不仅使其魅力大减,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来其内在价值的折损。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通常被割裂为相

互分离的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社会)实践话语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存在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领域,另一部分则是作为(美学)批判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落在哲学、文学、意识形态等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多地被当作一种社会理论来接受,与革命思想、国家理念、政体制度等紧密相联,而它美学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常常遭到搁置和延宕。这不仅显示了研究范式上的学科局限,也暴露出一定的地缘政治性。就西方社会而言,因为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上被当作一种介入性的文化批评话语来使用,法兰克福学派便是极好

的例证。与此相对,中国切身的革命经验,已经使得马克思主义被历史性地纳入到政治体系之中,并获得“国家思想”的身份和地位。这个中国化与经典化的结果,无疑影响了其批判功能的运作和体现。

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人类学研究曾经提出一个“回转”的理念,指“一种社会或文化坚持不懈要将自身转变到一种新的形态,但甚至在获致确定的形式后,它仍旧未能达成目标”(转引自王德威 53)。如果借用“回转”的理念,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经典化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各种力量的制衡与冲撞,对话与协商,即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知识或律条,我们也很难断言它完全达致了目标。更何况任何一种文化实践,总要面临“内在转化”的过程,一种文化面对另一种文化的刺激时,往往会产生创造性的转化,由此而促生的现代性,与其说仅仅是外来冲击所强加的,不如说是内在因素重组而形成的。^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经典化过程中知识与权力的相互角力,外在与内在的彼此刺激,在提醒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时,必须排除那种大历史叙述式的单音模式,而尽可能呈现喧哗的众声,无论这种声音是补充、修正,还是挑战、颠覆。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思考,让我们看到了其中不断冲突、不断对话的回转立场。早在 1960 年代,谷梅(Merle Goldman)在其《共产主义中国的文学歧见》(*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一书中,就对四五十年代,纠缠于革命作家(如何其芳、胡风、冯雪峰、萧军、丁玲等人)和政党政权(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文学分歧做了细腻的解剖,打开了政治意识形态之下更为幽微曲折的文学主张。踵武其后,是夏济安《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关于左翼和左联的精彩研究,同谷梅的解释模式完全不同,夏济安避开了将权力和艺术作二元对立的方法,转而去发掘艺术体系内部、个体生命进程之中或者政权组织形态中间所产生的种种龃龉。比如针对瞿秋白的讨论,夏济安就着力指出其软心肠的根源,并非由于他摆荡在政治抉择和主观情志的两难之间,而是他过

去的生命感受一再搅扰对革命的投入,最终令他不断反省以至于畏葸不前。当然,尽管夏济安的思路避开了大小主体之间的二元对峙,甚至发掘出其内部互有咬合的共通成分,可是,那些表面上看似并不合辙的部分,仍有可能成为一事之两面。王斑在关于革命影片的考察中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认为感官化的欲求和快感并不是外在于革命理性、需要被压抑的部分,恰恰相反,它是政治言说的升华机制和崇高根基。于是,公与私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结合为一体,实践了一种政治美学。^②当然,不是公众化的关怀总要透过私人化的表述才能够达成,而是两者从根本上是一体的。

除了以上三种文学意识形态的阐释之外,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种迄今仍不为人所重视的观点,即政治对文学所造成的不仅仅是压抑,在某种意义上,它可能也是助力。这种受虐狂式的解释,或多或少可以从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中获得支撑。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学场是一个力量场,这个场对所有进入其中的人发挥作用,而且依据他们在场中占据的位置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这个场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斗争场,这些斗争倾向于保存或改变这个力量的场”(208)。文学场就是一个永无宁日的战争世界,个人或者团体基于场内占位的考量,总是需要不停地与他者进行斗争,以期维持或获得新的位置与地位。换句话说,一个作家或机构的可辨识度部分地取决于同他抗衡的对手的地位和名望。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试图同国家体制或政党意识形态对抗的作家,比起那些在同辈中奋力竞争的人来说,总是更加容易成功。比如北岛早期诗作中那个集体化的声音之所以能深入人心,正是得益于六七十年代那个特殊的文化语境。因此,不必过分放大政治意识形态的钳制性力量。在一份针对 1930 年代文学审查制度的研究中,贺麦晓(Michel Hockx)明确提出,此时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因为受到政治审查而变得一蹶不振,恰恰相反,作家们通过成功地与审查者周旋,获得了相当程度上的创作自主,作品的产出也表现得相当活跃。^③这种现象同样出现于电影行业。孙绍谊指出,直到 1920 年代末才逐渐体制化的中国电影审查制度,在电影内容的管束方面实在是捉襟见肘,乏善可陈。它不得不变相地通过对刊登电影广告和具体排片等方面施加影响和压力,来实践和传

递其权威。^④

贺麦晓和孙绍谊两位的讨论,使我们获得了一个立足点,来反思中国语境下“场域理论”应用的适切程度。他们至少在两个方面给予我们以启示。其一,不能简单地将“场域”理解成一个各种势力此消彼长的空间。这种看法简化了各种关系间的拉锯、斡旋、合谋,甚至改头换面的可能,以目的论取代过程或结果。其二,是恢复了一般读者或曰大众的价值。在布尔迪厄的分析中,唯有作家、编辑、出版商以及那些具有生产能力的读者(即可以经由文学消费来重新生产文化产品的批评家、教师、学生等等)才是文学场的主角。他对普通读者的忽视是植根于这样一种认知和现实:即“文学史学者研究某一历史时期时,一般对文学生活当中没有批评能力和生产能力的人物无法求得实际的了解”(转引自 贺麦晓 298)。因为公众无法用文字、影像来记录自身,所以势必变得淹没无声。这样的思路略显简单化。孙绍谊提醒我们,政治审查的最终目标并不是电影或其表述本身,而是其观看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规训与启蒙具有同构性:公众或者说一般的读者,被想当然地处理成一个有待加工和改造的对象群体。可是,随着市民社会理论的兴起,这种任人鱼肉的公众形象,重新得到检视和重视。在分析民国时期的一桩女性复仇案件时,林郁沁就深刻地指出,源于大众的感性力量——同情,也有可能成为影响整个文化局势和走向的重大因素之一。^⑤回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论域,舒允中以更为具体的对七月派的研究表明,照搬场域理论来诠释中国的文学与政治关系,可能面临巨大的风险。在他看来,这个流派可以视为左翼文学内部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有不同见解和立场的团体之一。他们对左翼主流的挑战,恰好暗合了布尔迪厄的斗争说。不过,这种冲撞尽管使其成名获利,但是,其最终的结果并没有如布尔迪厄所预料的那样因为受益不均而导致团体自身的分崩离析,更为重要的是,七月派也没有因为过分执着于对外斗争,而放松对自我的反省。这一点恰恰是布尔迪厄疏而不论的。^⑥

欧美汉学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关系的重视,其实昭示了海外学界的某种范式转移。1993年,刘康点名批评了以夏志清为代表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仍未摆脱冷战意识形态的

理解套路,不是对左翼和革命文学视而不见,就是有意淡化历史语境,耽溺于文字和语言的技术操作。尽管这种观点招来林培瑞(Perry Link)、杜迈克(Michael S. Duke)和张隆溪等人的批评性回应,可是,它也不无深意地提出了一个如何借“文化批评”来重新理解和正视中国、中国现代性以及中国革命传统的问题。^⑦众所周知,欧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美国的部分,之所以会在滥觞阶段表现出强烈的冷战色彩,与当时大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随着冷战的结束及学科的独立,学术自主意识越来越明确,原来恁此刑彼的对抗模式,便逐渐丧失了效用,并被愈来愈广泛的“现代化”解释理路所取代,各种后现代、后殖民的新式理论也都要在此领域一显身手。不过,这一范式的转移,也相应地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即这些西方理论能否真正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其解释的限度何在?理论的边界又何在?我们不妨以刘康的《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为个案来略加论述。

二

如果说西方世界经历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那么,对一些海外学者而言,因为缺乏相应的物质条件,中国社会真正经历的只是革命的现代性。要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社会、理解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核心问题。于是,探讨“革命”、政治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不单纯只是一个学术议题,它也标示着“现代性”范式的转向,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当代社会所作的借喻式的解读和介入。这一介入的中心,正是以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美学闻名的杜克大学,1990年代形成了一股热烈讨论中国革命、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潮,其成果主要包括由刘康和唐小兵合编的《现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话语》(*Politics, Ideology, 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刘康的专著《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他们的西方同行》(*Aesthetics and Marxism: Chinese Aesthetic Marxists and Their Western Contemporar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以及唐小兵编的文选《再解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这些成果的中心关怀,就是理论干预和文化研究,通过历史性地恢复中国文学语境的复杂度,并借由女性批评、意识形态分析、后现代理论等,来重新检测现实主义、自我/主体以及现代性等观念。这不仅为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议题,同时,也积极地探索与示范了一种全新的阅读策略,^⑧“阅读不再单纯地解释现象或满足于发生学似的叙述,也不再是归纳意义或总结特征,而是要揭示出历史文本后面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唐小兵 15)。

刘康的《马克思主义与美学》是迄今为止唯一从美学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深入剖析的论著,与德里克(Arif Dirlik)从史学角度作出的观察相映成趣。^⑨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视为一个既成事实,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勾勒出一条绵密而曲折的发展谱系,但前者却一反常态地将其视为中国现代化的认知装置和解释动力,把“革命文化”或曰“革命意识形态”提升到探索中国现代社会思想变迁和文学写作转变的本体论位置上。《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的思路与价值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观察。

首先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化”的处理。所谓“历史化”大致有三个不同的向度。一是历史学意义上的那个“回到现场”。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必须切实地与中国革命经验和现实相结合,才不会轻易落入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学院点评之中。二是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海外学界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经历了历史性的“范式转移”,从六、七十年代的“革命范式”转向八十年代的“现代化范式”。^⑩在此背景下,作者试图说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和实践资源,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带来何种问题和启示。比如,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愈演愈烈的“现代化”大叙述,在涂抹革命记忆的同时,也掩盖了自身曲折繁复的发展谱系和运动轨迹。为此,作者使用“另类现代性”的概念,来应对所谓单一(uniqueness)、统和(unity)的“现代性”。三是全球化的历史语境。我们当然不能一味地抵制和否认“中心/边缘”、“中国/西方”的叙述模式,诚如德里克所言:“如果没有欧洲中心主义构图的传统和遗产,我们怎么书写世界呢?如果不参照这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对历史的书写,甚至对反欧洲中心主义的书写,都

会是晦涩难解的”(162)。即便是“亚洲作为方法”这样流行的研究理念,也部分受益于“中心/边缘”这个经典解释模子的失效或力有不逮。尽管“全球化”也有可能带来平面整合的风险,但它同时提醒我们,即便是在西方或者说欧洲内部,亦同样存在不同的文学、文化、历史、政治和社会形态。这个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不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产生、讨论的语境,也是其如何被看待、利用、辩难,甚至进入文化和政治资本跨国流通的语境。

其次是革命传统与批评性的介入,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对当代学术生态以及社会思潮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和批评性的介入。1980年代以来的“文化高热”^⑪以“告别革命”的姿态,将贯穿1920年代的左翼思潮到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红线进行淡化处理,尝试借“文化”消弭“革命”,摆脱“意识形态”的缠绕。当然,标榜“文化”,并不能就此撇清与政治、革命欲罢不能的关联。“后革命”的“后”不是“终结”,而是新的思想形态对旧的思想形态的反叛和新变。换言之,所谓“后革命”仍是要处理“革命”的传递不辍,消长代换。只有正视中国的革命历史及其精神遗产,观察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话语的多重交错,才能更加深入、完整地理解“现代化”的多重脉络和发展动因,并进而实践一种“现代性的反思”。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意图与价值,不仅在于对“革命”做了历史性地回顾和正视,引发了现代性内部不同取向间的辩证对话,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当代文化政治和社会历史作出了借喻式的解读。显然,“革命”对作者而言,并不是指社会学层面上的那个“改朝换代”,而是指中国革命意识形态传统和话语体系当中,或者说美学层面上的“革命”。革命时代的理念和实践已经渐行渐远,并日趋“博物馆化”,而“革命时代的话语体系今天依然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支配体系”(刘康 99)。

再次是关于农民革命与文化革命的思考。针对中国现代化解释的多元性,作者特别愿意强调农民革命与文化革命(或曰意识形态革命)。他认为,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特征。自鸦片战争以来,无论思想界、文学界,还是政治、社会层面,革命论述已成大势。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工人

运动理论并不能在中国奏效,只有转面到农村寻求和创建革命的主体,试图建立起农民的革命主体意识。毛泽东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把民间、大众传统中可资利用的革命资源,进行了新的民族形式的加工、升华,甚至神化。从19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大众语文学”讨论,到1940年代的延安整风,再到1960年代的革命样板戏书写和文革实践,莫不如此,甚至1980年代的“文化寻根”,也残存了这种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子。它们共同致力于探讨中国现代化方案中的文化霸权、主体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实践等议题,建构中国式的革命意识形态,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借由历史性地谈论大众文艺、意识形态、主体观念和城乡结构,作者为我们演绎了“革命中国”的大宗,并启示我们,没有对革命现代化遗产的继承,没有对革命话语的创新,那么有关中国现代化的论述,只能是机械重复一种叙述模式。可以说,在中国,任何针对革命文学的研究,都切实地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背景。惟其如此,文学研究才不会是纯粹的观念操练。

三

刘康借助葛兰西“文化霸权”的理论,来解释瞿秋白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的问题,指出中国“革命”的核心,乃是要建立农民的主体性,并实现知识分子的“大众化”。但是,基于不同的政治形势,这相反相成的两面不断地碰撞、变化,引发了19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1950年代美学大论争以及1980年代文化反思等一系列思想和文学事件,把“主体性”问题和“知识分子”的价值推向了浪尖风口。环顾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论述,也基本上聚焦于上述几个时段、事件和议题。邓腾克(Krik A. Denton)有关胡风和路翎的讨论,就紧紧围绕着“自我”和“主观主义”的问题展开。^⑩不过,其研究的结果,早已溢出马克思主义的论说范畴,而直指胡风和路翎的“自我观”,不仅同“五四”反偶像崇拜思潮中的个人主义、西方浪漫主义式的个体自我相关联,甚至也与新儒家论述中关于自我的话语,以及与此相关的“天”之理念有牵连。这种阐述有效地警示我们,切莫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草草处理成一种西方理论的在华传播史,而应当被理解成福柯意义上

的赋权(empower)斗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相应地包含同其他文艺理论和思潮,如浪漫主义、儒家思想的竞争与糅合的过程。

在这方面,佛克马(D. W. Fokkema)特别考察了上世纪中叶(1956—1960)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所受到的苏联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系列清规戒律(*Literary Doctrine in China and Soviet Influence, 1956-1960*. Hague: Mouton, 1965)。佛克马以详实的史料告诉我们,“必须把1960年的中国文学理论规范看作是一种全新现象,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既不是独立于外国影响的产物,也不是本国传统自然发展的结果。它迥异于苏联的、西方的以及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规范,它是一个全新的、前所未有的产物”(257)。这个产物,除了受到佛克马所说的苏联和西方影响外,日本也是不容忽视的文化传播中介,比如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传播,藏原惟人就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显然,观察文化间、文学间的互动关系,未必要拘泥于“直中取”,亦可“曲中求”。所谓的“曲中求”,除了地缘的因素外,也指涉不同的文学思潮和理论间互有容受。比如马克思主义者的“自我”观念就完全可能包含浪漫主义、心理分析等内涵。我们不能完全沉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内部(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日本马克思主义)来思考它在中国的命运和遭遇,其他相关的文学和文化要素也都应当纳入到我们的观察视野中来。

在外来影响之外,中国文化自身的组织形态和结构关系也是左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因素。英国学者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就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的“同一性”对毛时代中国文学民间化和大众化的推动作用。在杜博妮看来,这种作用之所以能够生成并运作,正在于“传统中国社会中,尽管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个人财富差异甚巨,然而士绅和农民皆处于同一社会文化系统中,只不过各置一端而已”(McDougall 279)。换言之,毛泽东的大众化和民间化理念,事实上是在一个统一的文化整体内部,为彼此分离的两端(精英与大众),重新找到了一条互有关联的线索。这条线索最核心的部分,正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人称其为“超级文学”,因为它是“文艺,却明显绝不仅仅是文艺”(李洁非 杨勃 3)。杜博妮在其编著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0.) 一书中,以1943年10月20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讲话》为蓝本,翻译并透彻解释了这“绝不仅仅是”背后所蛰伏的文学功利观和马克思主义文学观。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讲话》的贡献不在于将政治标准引入文学,在于使文学泛政治化;不在于提出‘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于使它从仅仅作为观念物,进而生长为量化的可操控的组织结构”(李洁非 杨劫 167)。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是一个特别突出的方面。它不单反映了威权对文学之用最大限度上的搅扰和干预,并使得作家不断地科层化和制度化,而且也含蓄地提示我们,这个“有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知识分子传统形象历经蜕变和精神转折的过程。梅仪慈(Yi-tsi Mei Feuerwerker)的《丁玲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叙事》(*Ding Ling's Fiction: Ideology and Narrativ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特别通过“文本——意识形态——权势——个体生命经验”这个多维结构,来讲述丁玲一生的创作起伏。^①她认为,丁玲的小说“虽然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又不断探讨了写作的意义并修正了关于作家作用的概念”,可是仍未能给“有机化”的道路提出“任何明确的答案”,它只是帮助我们加强了如下一种认识,即“文学为了在一个激烈改变着的世界中取得生存的权利,它本身必须带着互有矛盾、模棱两可、变幻不定的性质”(梅仪慈 23)。

同样是针对丁玲的讨论,颜海平则从社会性别角度的角度提出了她的观察。她试图论说革命及其遗产性别化的可能,以“非真的韵律”(unreal rhythms)说明女性书写如何折冲在虚构的字里行间和现实的生物种性政治之中,并最终为其“柔弱”的身份赋权的问题。^②借助于女性主义理论,作者或许部分实现了刘康所期待的“理论干预”,但是,其明显不足在于,作者想当然地将女性“弱势化”了。这一处理方式,令人想起黄心村对周蕾所做的相似批评。她说:“周蕾对女性细节的强调也许确实为张爱玲的作品赋予了一种批评力度,但这种力度却仰赖于张被放置于那个边缘性地位,可是如果张爱玲并不是她那个时代的边缘

性人物呢?如果张爱玲其实完全属于主流,她和她的同行们实际上就是一种独特的战时通俗文化的主要构建者,那周蕾的边缘性论述还能成立吗?为什么女性叙述就必须是边缘化的呢?”(黄心村 45-46)。

在此,我不想把颜著的疏忽完全处理成个体事件,事实上,就海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倾向的做法,即人们习惯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或美学范畴,而不是如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具有批判性的概念或工具。这种偏向的直接后果,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经典化,混同于政治对文学的全面操控和挤兑。与此对应,是研究上不断出现所谓的疏离式、反叛式、挑战式的解读。这些解读把文学作品或作家的独特性,单方面地归结为它成功地规避了潜在或明确的政治准则,因而带有文学的自主性。这种认识也许并不错,但是,它至少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理论,它本身带有自我干预的特性。换言之,在向文学渗透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单是压制性的,它同时也提出了反思的可能。这种反思,既针对文学,也针对其自身。我想,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含义。借助于这个观点,我们反观当下愈演愈烈的红色经典的重读、重写、重演,可以发现这不仅是一个民间世界对官方话语及其历史叙事的质疑行为,同时,也是革命经验内部自我梳理的表现形式。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是一个已经可以盖棺定论的过去完成时,而是仍有待人们持续开发和讨论的现在进行时。因此,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这些成果,或许为我们进行下一轮研究预留和指明了新的阐述空间和论述向度。

注释[Notes]

①参阅吉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格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章。

②参阅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孟祥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16-51。

③参阅 Hockx, Michel. *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 Leiden: Brill, 2003. Chapter7.

④参阅孙绍谊:《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135-38。

- ⑤参阅[美]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陈湘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 ⑥参阅[美]舒允中:《内线号手:七月派的战时文学活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5。
- ⑦参阅 Liu, Kang. "Politics, Critical Paradigms Reflection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Modern China* 19. 1 (1993): 13 - 40. 林培瑞等人的文字亦在同期上。
- ⑧参阅 Lee, Leo Ou - fan. "Postscript." *Politics, Ideology, 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Theoretical Interventions and Cultural Studies*. Eds. Liu, Kang, and Tang Xiaobi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301.
- ⑨参阅[美]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 ⑩参阅[美]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
- ⑪有关这个概念和现象的讨论可见 Wang, Jing. *High Culture Fever: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Ideology in Deng'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⑫参阅 Denton, Kirk A. . *The Problematic of Sel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u Feng and Lu Ling*.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⑬有关个多维结构的相关表述还可参阅 Mei Feuerwerker, Yi - tsi. *Ideology, Power, Text: Self - Representation and the Peasant "Other"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⑭参阅 Yan, Haiping. *Chinese Women Writers and the Feminist Imagination, 1905 - 1948*.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中译本见[美]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季剑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 [Bourdieu, Pierre. *The Rules of Art*. Trans. Liu Hui.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11.]
- 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62。
- [Dirlik, Arif. *Post - Revolution Aura*. Trans. Wang Ning, et al.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162.]
- 佛克马:《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季进 聂友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Fokkema, D. W. . *Literary Doctrine in China and Soviet In-*

- fluence, 1956 - 1960* . Trans. Ji Jin and Nie Youju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 贺麦晓:“二十年代中国‘文学场’”,《学人》(第13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295 - 317。
- [Hockx, Michel.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in the 1920s in China." *Scholars* (Vol. 13). Nanjing: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98. 295 - 317.]
- 黄心村:《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胡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45 - 46。
- [Huang, Nicole. *Women, War, Domesticit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40s*. Trans. Hu Jing. Shangha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45 - 46.]
- 李洁非 杨劼:《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
- [Li, Jiefei, and Yang Jie. *Reading Yan'an: Literature, Intellectuals and Culture*. Beijing: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0.]
- 刘康:《文化·传媒·全球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 [Liu, Kang. *Culture, Media and Globalization*.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 McDougall, Bonnie S. . "Writers and Performers: Their Works, and Their Audiences in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 - 1979* . Ed. McDougall, B. S.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269 - 304.
- 梅仪慈:《丁玲的小说》,沈昭铨 严锵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
- [Mei Feuerwerker, Yi - tsi. *Ding Ling's Fiction: Ideology and Narrativ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 Shen, Zhaokeng, and Yan Qiang.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1992.]
- 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 17。
- [Tang, Xiaobing. "How Do We Imagine History?" *Re - interpretation: Mass Culture, Popular Arts and Ideolog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1 - 17.]
-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宋伟杰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3年。
- [Wang, Dewei. *Fin - de - 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 - 1911* . Trans. Song Weijie. Taipei: Corn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责任编辑:王嘉军)